



宗教与历史

RELIGION AND HISTORY

2

中国基督教青年学者论坛

丛书主编：陶飞亚 执行主编：杨雄威

上海大学出版社

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

宗教与历史

RELIGION AND HISTORY

2

中国基督教青年学者论坛

丛书主编：陶飞亚 执行主编：杨雄威

上海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基督教青年学者论坛/杨雄威主编.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3. 7

(宗教与历史/陶飞亚主编: 2)

ISBN 978-7-5671-0880-6

I. ①中… II. ①杨 III. ①基督教-文集 IV.
①B978-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4389 号

责任编辑 焦贵平 徐雁华

封面设计 施羲雯

技术编辑 金 鑫 章 斐

中国基督教青年学者论坛

丛书主编: 陶飞亚

执行主编: 杨雄威

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上大路 99 号 邮政编码 200444)

(<http://www.shangdapress.com> 发行热线 021-66135112)

出版人: 郭纯生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排版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9 字数 618 千字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1-0880-6/B·070 定价: 98.00 元

“宗教与历史”丛书编纂说明

宗教与历史在目前的学科结构中,前者被置于哲学一级学科之下,而史学一级学科下没有宗教史的分类。但在实际研究中,两者的交集是显然的。上海大学历史系和上海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多年来致力于宗教与历史的研究。目前研究的领域已经从基督新教历史的研究,逐步扩展到天主教以及其他宗教领域的研究。在今天学科大融合的背景下,我们也希望借助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推动宗教与历史的研究。此次推出“宗教与历史”丛书就是这方面的一次尝试,希望这套丛书能一直出版下去,形成系列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希望有兴趣的研究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积极参与,踊跃来稿。

本丛书的内容及编写体例说明如下:

- 收录国内外有关中国宗教与历史的前沿理论研究成果;
- 收录有关中国宗教与历史的专题研究成果;
- 收录介绍国内外中国宗教研究的著作以及相关的书评;
- 收录介绍国外有关中国宗教研究的译著,等等。
- 本丛书注释格式采用《历史研究》杂志的注释格式。
- 本丛书所选文章一律采用匿名评审进行甄选。

本书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语基督教文献书目的整理和研究”(12&ZD128)、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重点学科(第五期)“近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史”(J50106)和上海市高校一流学科(世界史)资助。

“宗教与历史”丛书编委会成员

陶飞亚(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基督教研究)

郭长刚(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 海外宗教研究)

郭 红(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基督教研究)

黄景春(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道教、民间信仰研究)

刘 义(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

肖清和(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天主教研究)

舒 健(上海大学历史系讲师 天主教研究)

杨雄威(上海大学历史系讲师 基督宗教研究)

杨卫华(上海大学历史系讲师 基督教研究)

成 庆(上海大学历史系讲师 佛教研究)

黄 薇(上海大学历史系讲师 犹太教研究)

序 言

陶飞亚

—

基督宗教是一个跨文化的社会现象,对基督宗教的研究也涉及到了不同的学科。从国际学术界来看,近代以来的基督宗教研究大概经历了传教士研究、教会历史研究、基督宗教与社会文化以及正在兴起的世界史脉络中的基督宗教研究等几个阶段。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一直从哲学、历史、文学的角度对此问题展开探索。近年来社会学、人类学、宗教与国际关系等学科视野下的基督宗教研究也呈现日益增长的趋势。众多青年学者也表现出对跨学科视野下基督宗教研究的浓厚兴趣。为此,上海大学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上海大学全球学研究中心,以青年学者(青年教师、博士生)为主,于2011年12月19—21日在上海大学召开了一次多学科、多视角下的中国基督教研讨会,意在为青年学者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推动中国基督宗教研究的深入发展。

会议通知发出后,得到全国各地青年学者的积极响应。在不长的时间内,会务组共收到论文80余篇。最终会务组经过集体讨论,遴选了其中的40余篇作为本次会议的报告论文。论文的作者来自上海社科院、金陵协和神学院、华东神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等30余家学术单位。他们的学科分布涵盖了历史学、宗教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国际关系学等多个学科。毫无疑问,他们的文章展现了中国基督宗教研究领域的广阔视野。会议按主题分10个小组进行了专题式讨论。为了增进不同学科之间的有效对话,会务组特意将不同学科的青年学者安排进同一小组,获得了不错的反响。

在这次会议中,会务组有感于青年学者群体的成长,认为有必要将与会文章结集出版,从而向学界展示中国基督宗教研究领域的新势力和新成果。于是,我们从2012年春着手对与会文章做进一步的遴选,获得36篇论文,然后请原作者对文章做进一步的修改完善。继而,我们对现有文章依据时段和专题进行了新的分类,交由上大出版社出版。经过审稿和编校等程序,终于得以面世。

二

这本论文集分为明清、人物与思想、冲突与运动、社会改良、当代基督宗教及其本土化、基督教文献等六个板块。现依次介绍如下:

1. 明清

明清天主教研究一直是中国基督教研究的传统重镇,其研究内容与视角层出不穷。中国人民大学的刘贤将近代中国宗教史研究的开创者陈垣的宗教史研究置于西方宗教学发展的脉络中,认为前者代表着中国宗教研究的三个现代转变。陈垣主要是从描述的、历史的、比较的进路作宗教史研究,根本上是为了补史,在历史学科中开拓宗教史的分支。中山大学的王格研究了晚明意大利耶稣会来华传教士高一志(Alfonso Vagnoni, 约1566—1640)神父于1635年所撰《修身西学》(又名《西学修身》)中的“孝悌”观。认为“孝悌”本来是传统中国儒家的核心价值观,而高一志神父借此植入天主教神学内容,在其策略和方式上恰到好处。福建师范大学的代国庆则考察了明清之际徐光启、张星曜、吴渔山等中国奉教者诗中对玛利亚的描述,并认为这种诗歌创作不仅宣扬了玛利亚的神学形象,而且还开创了一种本土化的宣教方式,而中国天主教诗文由此肇其端。欧洲来华天主教传教士主导圣经故事版画集的翻刻,版画或直接仿刻欧洲圣经故事画册,或依据欧洲布道书册刻制,他们利用圣像画所具有的象征性和启示性,着重向世人宣扬基督教义。复旦大学的纪建勋对中国制造望远镜第一人薄珏及其望远镜之学进行了研究,作者首先对薄珏的生平进行重新梳理,并对薄珏之学受西学影响说法予以坐实,认为薄珏在科技方面的学问无一例外都受到了西学的影响。南京大学的朱光磊则考察了黄宗羲对天主教的评论,认为黄宗羲的思想来源既有儒家义理系统的观照,又有来自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学说的影响。

2. 人物与思想

在华传教士一度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他们尤其对近代基督教的在华传播起到过直接的、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这个群体始终是学界研究的重点。西北大学的杜敦科探讨了狄考文对“God”汉译的观点,狄考文通过考察“神”的一般含义和普通使用情况、中国语言使用的规律性、中国人的信仰习惯、“神”在汉语中的最初含义以及“神”的其他运用和含义等方面后,认为“神”完全可以指代“God”。山东大学的崔华杰探讨了近日来华传教士赫真信的《孔子家语》译介活动,他认为在西方汉学史上,赫真信译本是《孔子家语》的首部英文翻译文本,它所使用的注释特点代表了当时传教士的汉学研究特点,侧面体现出他们从传教士向早期汉学家身份过渡的变化。南京大学的刘钦花研究了中国穆斯林中的来华传教士先驱——梅益盛(Isaac Mason),梅益盛是英国公谊会传教士,在华从事穆斯林传教工作共约15年,作者汇总梅益盛著述,考察其在华传教和工作经历,分析了梅氏的传教和学术成就及其影响。上海大学的梁珊探讨了伦敦会来华传教士伊博恩与他的中医研究,伊博恩以平视的眼光审视中华传统医药学,作者通过

这一个案使读者认识到这一西方医学代表的中医观。暨南大学的吴青以昆明文林堂为例,探析了抗战时期何明华与学生福音事工。何明华是香港圣公会第七任英籍会督。抗战时期,他在昆明创建了学生教会文林堂,一方面通过文林堂积极拓展云南教务;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学生福音事工,为教会的未来争取中国的文化精英。上海大学的董飞则以女传教士艾伟德为个案,向读者展示了在华传教士在西方大众文化中的形象。

二十世纪上半叶,基督教在中国得到史无前例的关注,在动荡中发展的基督教在中国已经造就了一批中国本土基督徒。吴雷川等基督徒知识分子在当时最大的焦虑就是身份认同问题,河南大学的李韦探讨了徘徊于世界主义和爱国主义之间的吴雷川,吴氏以其独特的思想历程而完成了其对基督教的思考,这种思考是对于基督教本色化路径的独特探索。韦卓民开创性地提出了“综合东西文化”的新模式来处理基督教和中国文化的关系,华东神学院的胡应强从全球地域化的视角对韦卓民的文化神学思想的渊源和特征做了解析。抗战时期,沦陷区的各种社会群体对日伪的殖民统治有着不同的态度,中国基督徒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的王淼以王完白为例,探析了战时中国基督徒的第三条道路——相对于卖国求荣和坚持抵抗,他们选择的是不合作的第三条道路。这种不抗争、不通敌的不合作态度,反映了宗教团体和宗教信仰对战时民众心理的影响。山东大学的曲宁宁以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三位中外干事丁淑静、陆慕德和邓裕志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三位新女性在其时代中个人选择及各自所体现出来的意义。

3. 冲突与运动

近代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冲突是一直受人瞩目的一个传统话题。华中师范大学的王妍红以美国北长老会山东差会为例,考察了义和团运动中美国新教差会的应对策略。上海大学的耿向阳考察了传教士自身对涉及教会的“赔款问题”的认识和态度,通过其文章可以看出不同传教士个体对“赔款问题”的多样性认识。西南科技大学的龙伟以四川为个案,研究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在该地区所造成的影响。该地区的非基督教运动虽导致传教士前后三次全规模的撤离,然而传教士的撤离主要是受南方政局影响的遵命行事,而非受到本地非教运动的压力,教产所受冲击也不能一味归咎于非基督教运动。上海大学的陈铃考察了在中共取得全面胜利和美苏冷战的双重背景下,美国在华传教士在这一时期的前途命运及其应对策略。

天主教和新教同为异国教派,但二者在近代中国的冲突却时有发生。1860年以后,在中国的新教与天主教的传教事业均获得了极大发展,为了争夺正教地位,从1881年至1890年,新教与天主教之间展开了大规模的护教性辩论,上海大学的田燕妮根据多方资料对两教间的护教辩论进行了研究。

基督教为适应中国的形势,其内部曾进行过多种运动,经历了重大变迁。上海社科院的张永广以王明道所著的《圣经光亮中的灵恩运动》为例,来透析民国时期中国基督教基要派对灵恩运动的看法,并进一步以此来折射当时中国基督教界的信仰纷争。为复兴低沉的教会,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于1930年发动了著名的“五年奋进布道运动”。北京大学的张德明对五年运动的布道事工进行了探讨,认为五年运动虽未达到教

徒翻倍的目标,但是教徒数量与质量均有增长,带来了教会的复兴,也推动了教会的本色化。上海大学的吴云以中国基督徒会为例,探究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基督教会的自立运动。

4. 社会改良

社会事工是近代中国基督教研究的重要内容。北京大学的毕晓莹对美国公理会与民国通县乡村建设进行探析,文章认为美国公理会在通县的乡村建设出于基督教博爱精神与传播福音的双重动机,在开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世俗与宗教相冲突的两难境地,其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通县乡村落后的境地,然而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通县乡村的社会面貌。内蒙古社科院的刘春子对内地会的创立及其各分支间的关系以及它在绥远地区的发展,给予一个较为完整的论述,并展现了基督教事工在内地会融入当地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南开大学的杜希英以山东地区为例,探析了近代基督教传教士在山东地区所从事的社会经济改良活动,并认为这些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中华归主”。嘉应学院的周云水通过对粤东客家族群基督教信仰的实证研究,论证了客家基督徒依托灵性资本,不仅带动本地的非基督徒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而且依托客家宗亲文化促使全体村民自觉参与乡村建设。

相对新教而言,天主教与中国社会改良方面的内容素来不受学界重视。徐家汇圣母院育婴堂是近代上海天主教慈善事业的代表性机构之一,上海大学的王伟的研究基于丰富的史料,细致准确地考察了徐家汇圣母院及其育婴堂。

5. 当代基督宗教及其本土化

当代中国基督教呈现出怎样的新特征,与历史又有怎样的联系?多位青年学者的论文涉及这一话题。武汉大学的伦玉敏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以“鬼节梦”为切入点,通过分析云南华宁县盘溪镇的基督徒对待“祭祖”的态度和行为,以及由此产生心理焦虑的现象和解决焦虑的办法等方面,认为基督宗教自晚明三度入华以来所引发的长达三百多年的“礼仪之争”,今天依然存在。浙江大学的周晓微则通过对120位基督徒的电子问卷调查,向读者展现了中国年轻基督徒对于宗教对话的价值取向和内在态度,作者认为调查结果显示出中国当代年轻基督徒对于宗教对话的包容态度以及对自身信仰的坚持。兰州大学的严学勤以厦门、郑州和兰州三地为例,探讨了全球地域化视角下的中国地方基督教传播模式。中国基督教的本土化趋势在当代越来越明显。华中师范大学的高乐仁以南亚路德会(SALEM)为例做了一项个案研究,该教会在二十世纪后半期积极制定政策、采取措施,并于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前成功地使该教会变成独立教会。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的梁捷与厦门大学的刘盈曦通过一个“欺骗博弈”(liar game)的实验,检验了中国基督徒是否比普通非基督徒更少地主动欺骗,更多地信任他人。其结论认为,基督徒在“欺骗博弈”中充分体现出“博爱”精神,这种“博爱”动机而非“免于欺骗”动机可以解释大部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在实验中的行为差异,中国的基督徒确实比非基督徒要更少主动欺骗,更信任别人。

6. 基督教文献

近年来关于中国基督新教的研究方兴未艾,对于相关文献的发掘也不断取得成果。上海图书馆的徐锦华向各位学者初步介绍了上海图书馆所引进的“罗氏藏书”,这些书籍原为瑞典藏书家罗闻达(Björn Löwendahl)的藏品,包括书籍、手稿、版画等多种形态的文献1500余种,1400多册、件,时间跨度从1477年到1877年,包含拉丁、法、德、英、俄、葡、西、荷、瑞、丹等多种语言,其中既有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卜弥格(Michal Boym, 1612—1659)、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等著名来华传教士的代表作,也有国内学界所不熟悉的涉及礼仪之争、中国自然科技、人文历史方面的文献,甚至还有数种高迪爱(Henri Cordier, 1849—1925)的《西文汉学书目》(Bibliotheca Sinica)中所未见的文献。

来自厦门大学的张明认为,教会的民间文献是历史的片段与社会发展的缩影,落实在空间里,就是当地人接受基督教的过程,这是基督教在基层的真实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文献的搜集工作、草根基督徒的研究,将会给中国基督教史打开一片新的视域。作者并以兴化地区教会资料为中心,兼顾其他地区教会文献类型,对基督教民间文献系统做了初步梳理,并探讨文本的产生与发展历程,以及作为历史文献的意义和使用价值。

浙江大学的田力在发掘新史料的基础上,考证华花圣经书房的机构名称,重新统计其印刷情况,并补正该机构在宁波出版书目名录,初步考察了其在近代新教来华传教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上述36位青年学者提供的论文不仅展现出了中国基督教研究的广阔视野,也反映了当今学界的一大研究趋势——注重扎实的个案研究。毋庸讳言,其中一些作品稍显稚嫩,但瑕不掩瑜,现在青年人有很多机会,假以时日,他们会成为这个领域研究的主力。

目 录

明 清

陈垣的宗教史研究与近代西方宗教现象学试比较	刘 贤	001
高一志《修身西学》中的“孝悌”观	王 格	029
明清之际天学诗中的玛利亚	代国庆	037
我国制造望远镜第一人薄珏 ——以其与西学关系考辨为中心	纪建勋	046
黄宗羲论天主教	朱光磊	069

人 物 与 思 想

狄考文对汉语“神”的解析	杜敦科	076
晚清英国传教士赫真信与《孔子家语》译介	崔华杰	086
梅益盛——中国回族穆斯林中的基督教传教士	刘钦花	095
伦敦会来华传教士伊博恩与他的中医研究	梁 珊	108
抗战时期何明华与学生福音事工 ——以昆明文林堂为例	吴 青	121
徘徊于世界主义和爱国主义之间的吴雷川	李 韦	132
韦卓民综合东西文化神学思想解析	胡应强	144
寻找意义 ——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研究	曲宁宁	153
西方大众文化视野中的来华传教士 ——以艾伟德为例	董飞飞	169
战时中国基督徒的第三条道路 ——王完白与孤岛时期上海重整道德运动	王 森	177

冲突与运动

- 义和团运动前后的美国北长老山东差会 王妍红 188
- 传教士对教案赔款问题的考量
- 以《教务杂志》为中心 耿向阳 201
- 20 世纪初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研究
- 以中国基督徒会为个案 吴 云 209
- 作为经历的历史
- 传教士视野中的四川非基督教运动 龙 伟 219
- 民国时期中国基督教基要派对“灵恩运动”的认识与批判 张永广 229
- 挫折与复兴
- 五年运动之布道事工初探 张德明 237
- 《两教辨正》阐释 田燕妮 253
- 失去中国
- 革命、冷战与美国在华新教传教士 陈 铃 265

社会改良

- 福音与改良
- 美国公理会与民国通县乡村建设论略 毕晓莹 275
- 中国内地会与绥远社会 刘春子 291
- 近代基督教传教士社会经济改良活动探析
- 以山东地区为例 杜希英 303
- 徐家汇圣母院及其育婴堂的历史考察 王 伟 318
- 宗教灵性资本与乡村建设探析
- 粤东客家族群基督教信仰的实证研究 周云水 326

当代基督宗教及其本土化

- 香港南亚路德会的本土化 高乐仁 337
- 中西宗教对话视域中的中国基督徒“鬼节梦”
- 以云南华宁县盘溪镇乡村基督教为例 伦玉敏 351

基督徒很少骗人？

——来自实验的证据 梁 捷 刘盈曦 360

当代中国知识阶层基督徒佛耶对话态度的实证研究 周晓微 374

基督教传播的地域化适应与传播模式

——以厦门、郑州和兰州三地的实证研究为例 严学勤 382

基督教文献

“罗氏藏书”中基督新教相关英文文献概览 徐锦华 392

基督教民间文献初探

——以教会音乐和诗歌本为例的分析 张 明 409

华花圣经书房考 田 力 428

陈垣的宗教史研究与近代西方 宗教现象学试比较

在宗教的学术研究上,西方远早于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宗教研究刚刚起步,西方学术界已经发展出来了“具系统而客观的宗教研究”^①。这一时期中国宗教研究的“最显著成果,是在宗教史学方面”^②,在方法上则处于“文献学与历史学研究阶段”^③,但是这样的描摹不免有失粗疏。^④对于奠定中国宗教研究基础的那些重要学者,且不说曾游学海外精通多门并对佛教之于中国的影响有过深刻阐述的陈寅恪,留学英美攻读比较宗教学留下永未完成却是近代名篇《道教史(上)》的许地山,还有在美研读过各类宗教著作写下许多宗教笔记并开创中国断代佛教史的汤用彤^⑤,即使是被视为“土法”治史^⑥,广泛涉猎外来古教、基督教以及佛道各教、被陈寅恪看作中国宗教史研究开创者^⑦的陈垣,在宗教研究中体现出来的现代学术方法和宗教研究观念,迄今都未得到认真细致的考察。他们的学术探索理应成为今日宗教学术研究薪火相传的宝贵资源。

本文即以陈垣的宗教史论著作为研究对象,并尝试将其与同时期的西方宗教学特别是宗教现象学相对照。作这样的比较,并不意味着按照西方的历史和标准适履中国的宗教研究,而是通过参照和对比,试图部分地把握中国的宗教研究在世界范围的宗教

① 黎志添:《宗教研究与诠释学——宗教学建立的思考》,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页。

② 何光沪:《中国宗教学百年》,《学术界》2003年第3期。

③ 葛兆光:《中国(大陆)宗教史研究的百年回顾》,《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北京:三联出版社2003年,第202—215页。该文最早发表于《葛兆光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④ 葛兆光先生指出:“这一百年的时间里,研究中国佛教道教以及其他宗教的著作与论文很多,也经历了相当复杂的变化过程,不小心的概括有可能导致描述的失真。”他将二十世纪中国宗教史研究“大体可以分为文献学与历史学研究阶段(1950年以前)、哲学史研究阶段(1980年代以前)、社会文化史研究阶段(1980年代),以及近来刚刚出现,也许会持续到下一个世纪的宗教史研究的转型阶段。”他也承认,这一概括是“从个人的理解角度,用粗线条来描述其轮廓”。同上注。

⑤ 可参赵建永《汤用彤哈佛大学时期宗教学文稿探赜》,《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第1期。

⑥ “土法”一说,最早见于胡适引陈垣对《元典章校补释例》的自谦评价。“援庵先生对我说,他这部书是用‘土法’的。我对他说,在校勘学上,‘土法’和海外新法并没有多大的分别。”胡适:《校勘学方法论——序陈援庵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四卷三号,抽印本,第7页。后来许冠三等在概述陈垣史学时,引用该说法称其为“土法治史”。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

⑦ 陈寅恪:《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陈垣著:《明季滇黔佛教考》,辅仁大学1940年。

研究发展历程中所处的阶段和位置,或许也可以充实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宗教研究的学术史。^①

一、陈垣宗教史研究^②概述

陈寅恪之所以高度评价陈垣的宗教史研究,是因为在他看来,陈垣突破了对宗教的“意执之偏蔽”和“知见之狭隘”^③,在范围上也相当全面,1940年陈寅恪在为陈垣的《明季滇黔佛教考》所写的序言中说:“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④陈垣在不同宗教的研究上所作的贡献至今仍为学者所称道,被认为“五四以来,能够长期及有系统地进行宗教史研究的中国学者中,以陈垣的成就和贡献最大”^⑤。

实际上,把陈垣看作“中国宗教史研究的开创者”也并不为过。之所以这样说,笔者认为,陈垣的各种宗教研究,从整体而言,第一是时间早,有些从他而始,之前没有;第二是范围广,若只研究一两种宗教的历史,不能总称之为“宗教史”;第三是程度深,否则只有“开始”之名,不能得“开创”之功。事实上,中国的也里可温研究、火祆教研究都是之前所无,由他开始的,此为“时间早”。他除了涉及不同时期基督教来华的状况(也里可温教、景教、明清天主教)之外,也关注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各种外来宗教,除了研究中国化了的佛教之外,也涉及中国本土道教,此为“范围广”。他不单从教内研究,也从学者角度客观研究;他不单作纯教外的研究,也深入宗教的内部作反省思考,此为“程度深”。除此之外,他的宗教研究视角、方法及态度相较前人也是十分具有开创性的,这也是本文所要深入探讨的。陈垣在宗教研究方面的贡献至少应该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陈垣开创了二十世纪中国“古教研究”的绝学^⑥,即研究中国古代史上外来宗

① 关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宗教研究史及其与西方的比较,曾有学者涉猎,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础,但是他们的文章多是粗线条的概述。除上文提到的葛兆光文意外,还包括卓新平:《中国宗教研究百年历程》,《中国宗教》1999年第2期;吕大吉:《中国现代宗教学术研究一百年的回顾与展望》,《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何光沪:《中国宗教学百年》,《学术界》2003年第3期。

② 关于陈垣的宗教史,以往的研究主要有郑世刚:《陈垣的宗教史研究》,《陈垣教授诞生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32—142页;张运华:《陈垣与中国宗教史研究》,《五邑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邱树森、罗惠荣:《陈垣对中国宗教史研究的贡献》,《五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汤开建、陈文源:《陈垣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暨南学报》2002年第24卷第3期;陈方中:《陈垣的中国天主教史研究》,北京大学陈垣研究室编:《陈垣先生的史学研究与教育事业——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3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7—75页。以上学者分析较着重于陈垣的宗教研究贡献(或过失),而很少立足于宗教研究方法。而牛润珍的分析较为全面,将陈垣的宗教思想总结为信教自由、宗教平等;宗教与政治;宗教与文化;宗教与士人四个方面,为进一步研究奠定基础。牛润珍:《陈援庵先生的宗教史观》,《励耘学术承习录: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20周年》,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8—149页。

③ 原文是“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而宋代史家之著述,于宗教往往疏略,此不独由于意执之偏蔽,亦其知见之狭隘有以致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识,更不逮宋。”后文还将详解。陈寅恪:《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辅仁大学1940年。

④ 陈寅恪:《明季滇黔佛教考序》,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辅仁大学1940年。

⑤ 黎志添:《宗教研究与诠释学——宗教学建立的思考》,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xviii页。

⑥ 牛润珍:《陈垣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125页。

教在华源流和传播史,有《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袄教考》和《摩尼教入中国考》等。

第二,陈垣开创了中国基督教历史研究^①,近代中国人对于基督教入华历史的考证梳理当自陈垣开始。陈垣第一次把基督教入华历史分为:“唐代景教”、“元也里可温教”、“明代天主教”和“耶稣新教来华之后”四期;陈垣以乾嘉学派的踏实功底严谨考证校订了天主教教籍五部,为天主教在华传播史整理出宝贵的资料,此外还有天主教人物传系列和专题研究多篇。

第三,陈垣开始了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研究。有《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回回教入中国史略》,并文稿《回教汉文著述表》,均为研治伊斯兰教历史奠定基础。^②

第四,在佛教方面的突出贡献则在于文献的整理和介绍。有《佛教史籍概论》、《释氏疑年录》,前者是近代第一部介绍佛教史籍的目录书,后者则为研究2800位僧人乃至佛教史提供了重要线索。佛教著作有1940年完成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和《清初僧诤记》。此外还涉及佛教人物、佛寺、佛牙和碑刻等。

第五,在道教方面的贡献也主要是文献的整理。早在1923、1924年间,陈垣就开始编写《道家金石略》,“将《道藏》中碑记,及各家金石志、文集,并艺风堂所藏拓片,凡有关道教者悉行录出,自汉至明得碑千三百余通,编为百卷。顾以为校雠不易,久未刊行。”^③1988年,由陈垣的后人陈智超和曾庆瑛整理出版,成为今天研究道教史的重要的资料来源。1941年,陈垣还著有研究金元道教历史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所以说,在20世纪上半期研究宗教的中国学者中,陈垣是颇具典型性的一位,这也是本文选择陈垣作为中西对照其中一方的主要原因。

二、西方宗教学研究发展与宗教现象学的兴起

近代西方宗教现象学,在宗教学的谱系中是颇为独特的一个分支,也是本文中西对照的另外一方。以下将考察近代西方宗教学的发展简史以及宗教现象学的兴起及其独特性,以便于后文作详细比较。

西方的宗教学研究是摆脱了神学和哲学而独立出来的。十六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向欧洲人展示了形态各异的行为、思想和信仰,拓宽了他们关于人类本性、文化和宗教的视野,这是西方宗教学产生的外部原因之一;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有力地冲击

① 中国天主教史专家陈方中先生也认为,“在中国天主教史研究上,陈垣无疑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开创者”。陈方中:《陈垣的中国天主教史研究》,载北京大学陈垣研究室编:《陈垣先生的史学研究与教育事业——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3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7—75页。

② 据陈垣的弟子、研治回教史的白寿彝先生说:“他(陈垣)编纂回教志的设想,一直到今天,对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工作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白寿彝:《要继承这份遗产——纪念陈援庵先生诞生一百周年》,载《史学家陈垣的治学:励耘书屋问学记》(增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第106页。

③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一全真篇上“全真教之起源第一”,辅仁大学1941年,第11页。

了基督教神学,使宗教的神圣光环因之黯淡,这是西方宗教学产生的内部原因之一。早期的宗教研究或是从一定的神学立场出发,认为自己所信仰的宗教更优越,并试图说明其他宗教也可以体现基督宗教的普遍“神启”;或者是满足于简单的宗教起源观点,将所有宗教都视为虚假的。^①

早期宗教研究中这两方面的特点,在有些宗教学者看来,是幼稚(*naivete*)和失真的(*distortion*),因而需要在宗教研究中引入历史进路(*Historical Approach*),作宗教史(*History of Religions*)。宗教史要描述各地方各时代宗教的资料,并系统整理,用严格的自然和人文的框架(*natural and human framework*)解读,并通过比较发现宗教发展的本质规律。^②事实上,对宗教作不带有评价的描述,本身就是一种趋向客观的努力,是宗教研究能够摆脱神学立场和简单解释,走向客观科学之宗教学研究的基础阶段。

经过缪勒(*Friedrich Max Muller*, 1823—1900)在《宗教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Religion*, 1873)上的倡导,蒂勒(*Comels P. Tiele*, 1830—1902)于《宗教史概论》(*Outlines of the History of Religion*, 1892)和《宗教学的元素》(*Elements of the Science of Religion*, 1897)中的努力,科学的宗教学研究逐步在西方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在许多国家,宗教学研究的最初形式是宗教史学^③,即搜集整理各种宗教资料并进行比较研究。十九世纪末西方宗教学者的研究方法以“解释”为主要进路,即要“清楚地阐明宗教历史现象发生的自然性原因、动机以及它与其他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④

宗教现象学者却不满意前人“解释”宗教现象的进路,他们认为,自然界与人类有明显区别,前者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并解释(*explain*),后者却只能去理解(*understanding*),所以宗教现象不可以用科学方法解释,只能去理解。宗教现象学者主张,系统研究宗教的现象,放下对宗教经验中假定对象的真或假的宣称,用汇总描述和理解(而不是“解释”)的方法,悬置判断(希腊语 *epoche* “stoppage”),以便让现象自己去说话。这一进路是建立在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1938)和其后的现象学者基础上的。^⑤简言之,即把研究宗教现象本身作为目标,将对宗教的偏见、假设全部放在一边。“宗教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Religion)这一名词最早出现于商特皮 1887 年出版的《宗教史教科书》,宗教现象学传统的代表学者有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① Eymour Cain, “History of Study” of “Study of Religion”, in Mircea Eliade ed. in chief, *The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New York: Macmillan; 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c1987. v14, p. 64.

② 同上。

③ “在西方许多国家,宗教学最初以宗教史学的面貌出现。如法国 1885 年在巴黎建立的宗教学机构就称为‘宗教历史研究中心’,后来在斯特拉斯堡人文大学又有‘宗教史研究所’;著名瑞典宗教学者索德布鲁姆(*Nathan Soderblom*, 1866—1931)于 1901 年至 1914 年在乌普萨拉大学也办有国际宗教史研究中心;德国宗教学的初期,宗教史研究非常活跃,从 1903 年开始有专业丛书‘宗教史研讨与探究’等。”卓新平:《宗教理解》,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第 222 页。

④ 黎志添:《宗教研究与诠释学——宗教学建立的思考》,第 8 页。

⑤ “Phenomenology of Religion”, in John R. Hinnells ed, *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Religions*,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4. pp. 251 - 252.